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 本 全 注 全 译 丛 书

史 记

韩兆琦 译注

【四】

世 家



中 华 书 局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韩兆琦◎译注

史记

世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韩兆琦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6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7272-3

I. 史… II. 韩… III. ①中国-古代史-纪
传体②史记-译文③史记-注释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9591号

书 名 史记(全九册)

译 注 者 韩兆琦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周 旻 舒 琴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6月北京第1版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44½ 字数5000千字

印 数 1-6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272-3

定 价 420.00元



前 言

2004年,我的《史记笺证》出版,这是我几十年研究与讲授《史记》课的一个小结。此书的注释比较详尽,疑难字有注音,历史地名与古帝王的年号与记事干支都注有现今的新地名与换算的公元纪年与日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注释得比较明晰,重要的环节都引出原文;更重要的是此书引证前人评论《史记》的资料较多,有原文,有出处,这给青年教师、青年文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因此出版以来很受欢迎。此书于2006年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且已于2009年经过若干修改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但也由于《史记笺证》的重心是在校勘、注释、评论,没有白话译文,因而有些读者反映读起来吃力。前些年我在中国大陆也出过几种注释本,但都是选本;近年出了两个全译本,但又没有注释,特别是没有我们在做《史记笺证》时下了很大力气的“十表”,这是令人遗憾的。这次中华书局为反映《史记》全貌,为满足更广大的《史记》爱好者的要求,希望我来做这个“全本、全注、全译”的《史记》,我觉得是好事,于是欣然答应了。其实我所做的这套《史记》,内容远不仅是“全本、全注、全译”,而是汇《史记》的校勘、注释、翻译、评论于一身的集众萃之作。

本书对《史记》正文的校勘整理,仍是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基础,其所校改的内容主要的都已见于《史记笺证》,所明显不同的是本书对《史

记》正文凡应校改的地方都做了明确的改动，凡是做了改动的地方一定有相应的注释予以说明。这种有关校勘方面的注释总共将近五百条。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既能让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原文时清晰易晓，而同时又能知道这个句子在别的版本上是怎样的一种模样。这种校勘，主要是指文字方面的，此外凡遇到标点方面的重要分歧，因其严重地影响到文意，故而本书在改变点校本的重要标点时，也在注释中做了说明。

本书的注释，主要是依据《史记笺证》，但也有不少变化：其一是根据本书体例的需要对《笺证》的注释做了调整，诸如在介绍有关的古代遗存，在考辨古代人物、古代历史事件而引用诸多学者的资料时，本书就比《笺证》要简明得多了，大多以讲清结论为止。其二是在这次整理《笺证》注释的过程中，也吸收了《笺证》出版之后的研究成果，对原注释进行了许多修改补充，例如《周本纪》在写到文王死后，武王即位时，张嘴就是“九年”。有人认为这就是武王即位后的第九年；也有人认为这是文王称王后的第九年，文王称王七年而死，故这里的“九年”实即武王继位的第二年。用其他篇章来检验，《伯夷列传》写伯夷谴责武王时有所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似乎正与第二种解释相合。于是我们引用杨宽《西周史》的观点，改变了《笺证》原来的看法。又例如《赵世家》之叙长平之战，黄善夫本书曰“七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点校本改为“七月，廉颇免而赵括代将”。核对《六国年表》与《史记》中其他叙及此事的诸篇，书“七年”固然不对，书“七月”也不合理。因为本段文字的前文自从出过“四年”后，再也没有出过年，因此这里必须出“六年”二字，才能与其他各篇叙述长平之战的年头相合。即使事在七月，也必须是“六年”的七月。因此《笺证》力主黄本“七年”为是的说法也应同时修改。

本书为了读者阅读方便，对《史记》原文逐段进行了白话翻译。这项工作虽然我们有我们过去的译本为基础，但所做的改动不少：诸如译文

与校勘不一致的地方，译文与注释不一致的地方，译文的意思与我们自己的标点不一致的地方，以及原来译文中的不够流利、不够通畅、不够规范的地方等等。这样，本书白话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就更强了。

《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其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的意义、历史人物的背景，以及司马迁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与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做的判断等等，都不是单纯的白话翻译所能表达清楚的，因此我们给《史记》文章逐篇做了题解。“题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每篇作品所作的内容提要，即用精炼的文字将该篇内容加以梳理，使初读者读过之后能抓住其大纲要旨，不致混混沌沌，茫无头绪。二是将本篇作品所涉及的问题抽出三四个重点进行分析评述。这些问题有的是材料来源方面的；有的是涉及作者思想、立场的；有的是牵涉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更广泛、更深刻的时代背景，需要给读者进一步阐发的；有的是前人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论述，应该介绍给现代读者知道的；有的更是不同时代发生的惊人相似的事件，可以引发当今读者思考，可以令人举一反三，从中吸收历史教训的；还有些是作品的写作艺术极高，并对后代文学发生过重要影响，是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的；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不好混在注释中的前代、当代学者的精彩评论与我自己近年来讲课与研究观点等等。

三十年来，在进行《史记》教学与《史记》研究的过程中，我先后得到了国内、国外的许多师友、许多同仁，以及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许多出版单位的大力帮助，我对这些师友、这些同仁、这些出版单位的感激、感谢之情是难以言表的。我深深体会到，要做成哪怕只是一件事，没有众多友朋的大力帮助也是万万不能成功的。在以前出版的各种著作中，当时参加过编写工作或曾经给予过帮助的师友、同仁的名字，已见于当时各书的扉页或是前言与后记中；这次又参与本书修改工作

的同仁、友好还有牛鸿恩、陈曦、周旻、刘晓林；而中华书局为运作此书前后曾派出了多位编辑投入工作，在这里，我再次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韩兆琦 2010年1月



凡 例

一,本书原文基本参照中华书局点校本(在本书注释中统称“通行本”),承认点校本已有的校勘成果:凡点校本加有圆括号认为当削的字,本书一律不再保留;凡点校本加有方括号认为当增的字,本书即视为原文所应有,不再保留方括号;凡点校本认为某字有误,在前面用圆括号括起,又认为此字应作某,在后面又用方括号补出某字者,本文则直接删去带圆括号的字,直接补出应作之字。以上三项均不再于注释中提及。

二,凡本书认为点校本现有原文的某字明显有误,应依某本、或依据某校勘家的说法改作某字者,则在原文中径改作某字,并出注释加以说明。

三,凡本书认为点校本现有原文的某字显系衍文,应依某本、或依据某校勘家的说法削去该字者,则在原文中径削该字,并出注释加以说明。

四,凡本书认为点校本现有原文的某处显有脱漏,应依某本、或依据某校勘家的说法增补某字者,则在原文中径增某字,并出注释加以说明。

五,凡本书认为点校本现有原文的某处明显有误,但此前的校勘家又一直没有人说过话,而此处的错误又非改不可,本书则只好径改作某

字，而出注释予以考辨，说明要改的原因。

六，凡某帝王、某诸侯的系年有一连串的错误，这是由于司马迁使用的古代谱牒不同所致。为了保持《史记》原有的框架，我们一律不动原文，只在该改的系年下出注说明此处应作某某。

七，本书对于“十表”原文的校改与注释所下工夫颇大，对于那些一般字句的错误与脱漏，凡改动了点校本原文的地方一律加注释予以说明；对于某篇表中某个王侯世系年代的错误，凡要改动较多的地方，为了保持司马迁原表的模样，我们是仍将司马迁原有的世系年代照常列出，而在各王各侯的错误年代数码后依次列出我们认为正确的数码，用方括号括起，以示区别。

八，有关十表的注释，凡用字不多的，通常就放在本格内，字号比正文小一号，用括号括起，以取便捷。凡用字较多或需考辨的注释，则在格内要注的原文上标出注码，在该表的最后另外排列注释。

九，本书的标点是依我们自己的理解而定，有些分段，有些断句，以至于有些究竟是作者的叙述，还是作品人物的对话，也与点校本的理解屡有不同，这类问题一般不再另加说明，但遇有分歧较大，而又比较重要的地方则加以注释。

十，本书引用三家注以及其他各种新旧注本的注释文字，只节取其对解释本字词、本句、本段有用的部分，不一定首尾完整、只字不遗。

十一，本书引用古今中外学者评论某作品、某情节、某人物、某事件的文字，以中肯、扼要为原则，往往只节取其某一片断或某几个片断，不能篇幅过长。

十二，本书引用前人的文字凡直称“某某曰”者，为引自其本人的原著；凡称“某某人”或“某某书”引“某某曰”者，一般只照录某某人或某某书的引文，对其所引文字通常不作更多校改，因为古人引书并不规范，甚或只是撮述大意。

十三，本书引用考古资料、引用名胜古迹资料时，凡涉及思想观点、

个人见解的，往往引用某著作、某文章的原文；有些纯属知识范围的，我们只介绍其大概，而将我们所取材的若干工具书列之于后。

十四，本书对《史记》各篇的原文，都按照所叙事件的发展分成了若干段落，段末加有本段大意，以便于初读者把握故事梗概。

十五，本书对于《史记》原文中的生僻字与某些读音特殊的字，在注释中加注了汉语拼音。

十六，本书对于《史记》原文中的古代地名，在注释中主要依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年版)标注相应的今地名。

十七，本书对于《史记》原文为记载历史事件发生年代所用的古帝王、古诸侯的年号，一律在注释中换算为公元纪年。

十八，本书对于《史记》原文为记载历史事件发生月日所用的干支，一律在注释中为之加注了某月的“初几”、“十几”、“二十几”。

十九，本书对于《史记》原文所使用的古代度量衡，尽量在注释中注出了约当当前度量衡的数值。



史记 四

目录

吴太伯世家第一	2427
齐太公世家第二	2493
鲁周公世家第三	2602
燕召公世家第四	2692
管蔡世家第五	2733
陈杞世家第六	2775

卫康叔世家第七	2814
宋微子世家第八	2868
晋世家第九	2941
楚世家第十	3095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3222
郑世家第十二	3278



世家

吴太伯世家第一

【题解】

《吴太伯世家》是春秋后期崛起的吴国的兴衰史，司马迁认为长江下游的吴国是周文王的大伯父吴太伯、二伯父仲雍兄弟二人开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西周与东周前期默默无闻，但到春秋后期在晋国的帮助下强大起来，其巅峰时期竟至于打败强楚，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又打败越国，使其俯首称臣，但后来由于骄傲轻越，并在醉心于争霸中原的过程中耗尽了国力，最后被积蓄已久的越国所消灭，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但司马迁之所以把这一篇放在“世家”部分的开头，主要着眼点却在于他歌颂吴太伯的“让国”，以借此表达他的一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这与“本纪”开头第一篇的歌颂尧舜禅让、“列传”部分第一篇的歌颂伯夷是彼此呼应的。

司马迁写吴国的历史，并着重歌颂吴太伯，这对于研究司马迁的思想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吴国的诸侯是不是吴太伯的后代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蒙文通说：“吴阖庐、越句践，《荀子·王霸》并列为‘五霸’之二，然其突然兴起于春秋之末，忽焉微弱于战国之初，语言风俗皆与华夏不同，实当时后进民族之建国也。其情状与蒙古之勃兴而骤亡颇相似。然《史记》说吴为太伯之国，谓越为少康庶子之封，似皆华夏之裔，未必然也。此与魏、晋、隋、唐间少数民族之首领多自谓黄

帝、高辛之裔者同，不足信也。《穆天子传》卷二言：‘赤乌氏先出自宗周，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是‘赤乌’即‘吴’，吴太伯封国也。《汉书·地理志》有吴山在右扶风汧县西，有荆山在左冯翊怀德县南。雍州自有荆山、吴山，应即太伯所奔及建国处。‘勾吴’为太伯、仲雍后裔之说，不过《左传》一家之言而已，此与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之说，骠戎、大戎皆姬姓之说相同，是皆无根之谈，不足信也。”张亚初说：“根据文献、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研究的结果，认为春秋时期南方的吴国的始祖，并不是太伯、仲雍。太伯、仲雍奔吴说是吴国托始于中原的结果，是攀龙附凤的结果。山西之虞国未灭时，山西之‘虞’与江苏之‘吴’在写法上并不相混；而山西之‘虞’灭后，江苏之‘吴’才用‘吴’字。二国通过‘吴’字作为桥梁，发生了纠缠不清的联系。太伯、虞仲的老家可能在山西。”“吴为太伯后这一说，从寿梦前后就宣传开了，所以中原人在载籍无闻的情况下，所知道的吴国早期历史，只能唯寿梦之言是从，而《论语》、《左传》、《国语》都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的作品，难免不在吴国史上打下‘吴太伯记’的烙印。”以上两家的说法比较传统，也为多数学者所公认。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主张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这一点在吴越地区似乎更为流行。“太伯”的名字最早见于《诗·皇矣》，其中有所谓：“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从这几句诗里，可以引申出是由于太伯“让”出继承权，才使王季享有了周国。至于“作邦作对”是什么意思，有些模糊，大概杨宽先生所说的“太王派太伯、仲雍到山西建立虞国，给日后周国的向东方发展做桥头堡”就是从这几句话中悟出来的。《皇矣》是西周时期的作品，提供的信息十分珍贵。之外明确说到太伯“三以天下让”的是孔子，见《论语·泰伯》，但没有说到“奔吴”。说太伯“奔吴”，并说他在长江下游创建吴国的是《左传》与《国语》，司马迁的《吴太伯世家》主要就是依据《左传》与《国语》的说法写下来的。《史记》中曾有若干大名鼎鼎的人物不见于先

秦任何典籍，最早就见于《史记》，于是人们便争相传传说，深信不疑；而大伯创建吴国的事情最早见于《左传》、《国语》，而且在春秋后期的吴国屡屡向北方大国挑衅的时候，北方诸国竟然没有一个人对吴国的种姓提出怀疑，甚至连周天子也都承认，而事至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却对它提出怀疑，想否定它，这的确不很容易。但人们的怀疑是有道理、有根据的，我们也同样不能否认。对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今后的考古发掘，希望能在长江下游发现西周时期的吴国王室的墓葬，能从这些王室墓葬中肯定他们是不是与周原文化有联系。

司马迁视吴国为太伯的后代，与视越国为禹的后代，以及说匈奴的祖先为黄帝的后裔，出于同一种民族思想。这种周边民族向华夏靠拢、向黄炎血统靠拢的趋势，出现于战国中期以后，这在《国语》、《左传》、《世本》、《山海经》等书中都有表现，顾颉刚曾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做过专门论述，这种趋势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又有新的、巨大的发展，这种民族思想的形成是与武帝时期西汉帝国的空前统一、空前强大的客观形势密不可分的。太伯奔入荆蛮后，“断发文身”，入乡随俗的表现，与赵佗之在南越、卫满之入朝鲜的表现完全相同，也正是由于他们能首先将自己融于兄弟民族，所以他们才能在这些兄弟民族中站住脚跟，受到拥护，并逐渐在那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地方政权，这里也清晰地表露着司马迁的一种先进的民族思想。

吴国从寿梦时代开始强大，随后由于晋国反楚的需要，与吴国建立联盟，从客观上又促进了吴国的快速发展。吴与晋的联合给楚国带来厄运，阖庐入郢使吴国的强大达到巅峰；随后的夫差破越、败齐，更使吴国达到了一种更加宏伟的境地。阖庐与夫差都是发展吴国、发展长江下游地区的杰出人物，也是春秋末期最辉煌夺目的悲剧英雄。夫差的悲剧在于轻敌、在于方针路线的错误，而绝不是小说戏剧所演绎的“荒淫残暴”。与晋国为了反楚而支持吴国一样，楚国为了反吴而支持越国，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夫差不彻底安顿后方，而一味北上与

齐国争锋，从而使句践的阴谋得逞，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后来诸葛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力气“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地去“七擒孟获”了。但夫差的确不愧是一位令人抱憾的悲剧英雄。此文应与《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中的专诸部分参照阅读。

吴太伯^①，太伯弟仲雍^②，皆周太王之子^③，而王季历之兄也^④。季历贤，而有圣子昌^⑤，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⑥，文身断发^⑦，示不可用^⑧，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⑨。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⑩。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⑩。

【注释】

- ①太伯：史失其名，故以行(háng)称之。《索隐》引《论语》范宁注曰：“太者，善大之称；伯者，长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
- ②仲雍：“雍”字是名，“仲”字是排行。
- ③周太王：即《诗·大雅·绵》中所写的古公亶(dǎn)父。其世系、事迹见《周本纪》。“太王”乃武王灭商后对古公亶父的尊称。
- ④王季历：周文王之父，“历”是名，“季”字是排行，事迹见《诗经》中的《大明》、《皇矣》与《周本纪》。“王季”乃武王灭商后对季历的尊称。
- ⑤圣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昌”是名，事迹见《诗经》中的《文王》、《皇矣》、《文王有声》等篇与《周本纪》。
- ⑥荆蛮：泛指南方的蛮夷之地。《正义》曰：“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吴地记》曰：“太伯居梅里，在阖闾城(今苏州)北五十里许。”按，《正义》与《吴地记》所指实为一地，即今无锡东南三十里之梅村，其地有太伯墓、太伯祠，香烟繁盛，当地皆

尊以为太伯所奔之地。

- ⑦文身断发：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应劭《风俗通》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文，谓刺画文字或花纹。
- ⑧示不可用：表示已经完全改变了华夏民族的传统，不可能再回华夏地区继承王位。
- ⑨而昌为文王：姬昌为商朝西方的诸侯之长（伯），并未称王。“文王”之称，乃武王灭商后对姬昌的尊称。
- ⑩句(gōu)吴：“句”是南方的发语词。亦作“攻吴”、“工吴”。如“攻吴王夫差鉴”、“攻吴王光剑”等。
- ⑪立为吴太伯：《正义》曰：“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之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齐筑阖庐城都之，今苏州也。”吴见思《史记论文》曰：“不必借太王之业，不必待武王之封，见太伯自有圣贤经济，不特以让国为高。”按，今无锡鸿山南麓有“泰伯墓”，呈圆形，全由青石砌成。花岗石碑坊上刻有“至德墓道”四字，历代题咏最早的是晋代陆机的题诗。又，无锡伯渎河畔之梅村有“泰伯庙”，相传即太伯之故宅，太伯死后改为祠庙。关于吴太伯让国的传说，还见于《诗·皇矣》、《论语·太伯》、《左传·僖公五年》等。但太伯让国后，自己到什么地方建国另谋发展，人们的看法不同。司马迁接续《左传》的说法，说太伯、仲雍逃到了今江苏苏州一带，其所创建之“吴”即后来的吴王寿梦、吴王阖庐之吴。今之历史家多认为太伯所奔之“吴”，即春秋时代被晋献公所灭之“虞”，其都城在今山西平陆北。

【译文】

吴太伯和二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明，还生了一个德才出众的儿子名昌，太王打算立季历为后，以便把自